

# 古闽、客方言的来源以及历史层次问题<sup>①</sup>

邓晓华 王士元

(香港城市大学 语言工程实验室, 香港)

[摘要]本文从 Swadesh 提出的核心词的角度出发,认为古闽方言并非完全来源于“六朝江东方言”,古闽、客方言亦非完全来源于古北方汉语。闽、客方言的形成是北方移民语言与土著居民语言长期“交互作用”的结果。闽、客方言的音韵系统层面为不同时期北来汉语的层叠;但词汇则受南方土著语言影响深刻。客方言保存江东方言层次。就谱系亲缘关系来说,闽、客关系接近,而客、赣方言关系则较远。

[关键词]闽客方言史;核心词;历史层次

[中图分类号]H17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442(2003)02-0008-05

## 一、有关闽、客方言的来源以及历史层次问题的研究

方言史的研究是整个汉语史研究中的极其重要的一环。近年来,有关闽客方言的形成及其与周边族群的方言的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 闽方言来源于南北朝的吴语。<sup>[1]</sup>2. 闽方言来源于古吴语和古楚语;即来源于所谓的“六朝江东方言”。3. 闽、客方言均来源于古北方汉语,例如张光宇认为闽方言是永嘉之乱后,司豫移民和青徐移民汇聚在太湖流域杂染吴语后,再度南移入闽形成闽方言,其主要根源在中原东部。他认为闽语中的“客家”成分得自司豫民。认为汉语方言的南北关系仅仅表现为北方汉语的古今关系。<sup>[2]</sup>

在闽、客方言历史层次问题的研究方面,较有影响的主要有罗杰瑞、丁邦新、梅祖麟、何大安、李如龙等,从汉语音韵史角度,分析闽语白读音系统的层次问题,他们的研究极具开创性意义,其经典性的论述更使我们深受启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上世纪70年代,在罗杰瑞和梅祖麟的杰出研究中,就发现南方汉语跟南亚语语词之间的借用关系。但许多人的研究仍是从“汉族中心主义”出发。

我们认为方言的音韵特征,音韵层次及音韵现象的演变都有其地理因素,跟方言的区域性文化特征关系密切,并不能简单地归为北方汉语的南移。即使是古闽语的源头,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北方汉语,而是区域性文化交互作用的产品。现代闽语是由不同时代层次的音韵特点组成的,而这种音韵特点并不全是北方汉语南迁时带过来的。这种情况虽然也有,如等的分别,保存重唇等。但绝不能忽视地域文化特征对闽、客语形成的重大影响和作用。因此,方言特别语言现象及方言史的研究,必须跟古代文化区域之间的交互作用联系起来考虑。

我们认为闽语形成于汉唐,其底层反映有原南岛语、南亚语成分;这有一批基本词汇即反映基本生活、生态、身体部位最常用的核心词作证据。客语的音韵系统属于宋代北方中原音韵,而词汇系统则是北方汉语和南方土著民族语言混合而成。

## 二、闽客族群方言的特殊的人文历史传统

民族考古学证明:闽越及其先民的语言文化不同于中原的华夏系统。林惠祥认为“闽越族”及“先住民族矮黑人等”被“汉以后陆续南来的汉族”同化,成为现在的福建人,“其固有之语言与汉语混合而成为今闽方言”。福建早期土著民族发展史的大致线索是:传说时代是苗蛮集团的东支——“三苗”;商周时期是诸“蛮”;东周以后出现“百越”。《逸周书》《周礼》开始有“七闽”“八蛮”“越氐”等东南土著民族的记载,《山海经·海内东经》载:“瓠居海中,闽在海中。”“闽”即分布于福建一带的周代土著。汉代司马迁把东瓠和闽越归在一起,“闽越”“东瓠”合称“东越”,东越是福建、浙南间的百越支系。最近的考古学人类学研究表明古百越民族跟古南岛民族关系极其密切,有人甚至提出“古百越—古南岛民族文化共同体”的理论假设。

闽、吴语古文化的源跟流均不相同。最近的民族考古学研究表明,先秦时代的闽越(代表古闽语文化)与於越(代表

<sup>①</sup>本文的研究得到香港政府“汉语在亚洲语言中的地位”(CERG # 9040781)及台湾中研院“中国及各民族的起源及形成过程”的专项研究基金的资助。课题由王士元教授主持。本文是本课题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古吴语文化)应是独立的两个不同的古民族;从考古学分区看,较权威的分区是,把南方几何印纹陶遗存分为7区域,其中太湖区(即吴语区)印纹陶遗存是於越人的物质文化遗存,而闽台区(包括福建、浙南、粤东和台湾,即闽语区)的印纹陶遗存的主人则是闽越人。太湖区、闽台区的印纹陶遗存的来源是不相同的,是在当地原始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两区的原始文化是文化性质不同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从先秦至西汉前期,浙南温州系属闽越地,当操与福建相同或相似的古闽语,与浙北苏南的古吴语不同;直到西汉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在浙南设置回浦县,东汉二年(公元138年)又于章安(原回浦)置永宁县,由于浙南、浙北处于同一行政区管辖,开始同北部的吴语区人群有较密切的接触,从而形成温州系的特殊吴语。而客家话则是北方中原移民自宋元始插入闽越故地,同原住民文化——畬族文化发生融合而形成的。

主张闽语“吴来说”,“六朝江东来说”,“北方来说”,似乎接受语言单一来源的古典进化论的说法,这种语言史观认为方言文化的形成发展是自某一祖语文化一条直线贯穿下来。事实上,南方方言分布的地理格局在先秦时期已奠定基础,其后地方文化与北来的移民文化相互接触、发生融合甚至语言换用,形成现代南方汉语方言的格局。

秦汉以后,百越民族大部溶入汉文化中,但有部分越人逃避山里,成了东汉以来活跃于东南山地的“山越”。在唐宋文献中,这部分人被称为“峒蛮”、“峒僚”,其后代即今畬、瑶、壮、侗等少数民族。

福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闽东、闽南沿海“面向海洋的文化圈”和闽西、闽北内陆“面向内陆的文化圈”,构成福建早期古文化的两大体系。两大体系的早期古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分别都不同程度地与浙南、粤东、台湾岛上的古文化密切相关;其中诸河流域所在的下游沿海与上游山地的早期古文化又有区别,使得两大体系的早期古文化中的闽东沿海、闽北山地、闽南沿海、闽西山地又分别独立,构成闽越故地考古学文化的多样性格局。西周以前,土著文化的统一性、多样性和原始性非常鲜明;两周时期,由于商周、吴越文化的传播,形成以“复合文化”为特点的闽越文化形态。战国秦汉时期,闽越文化受楚、汉文化的影响,发生融合过程。两汉时期,福建文化仍然是以闽越文化为主体,反映汉、越两种文化的交流融合。其文化性质是汉化过程中的闽越族文化。至六朝,“永嘉二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大量汉人南迁入闽促成福建民族成分发生最根本的改变,汉文化已经成为闽越故地民族文化的主体。但汉化过程是逐步的、长期的、分地域的、最重要是互动的。

客家族群历史上居住于闽、粤、赣交界的山区,与历史上畬族的聚落地相重叠。我们认为畬族是唐时的土著“山越”与外来的“洞庭苗蛮”相融合的结果。商周秦汉时期,闽西的土著文化与整个闽越文化连为一体,反映出闽越文化主体特点。但闽西竟没有发现或罕见六朝隋唐宋的典型汉族文化遗存,如墓葬。客家几乎就是宋元时突然冒出的汉人族群。我们认为客家是晚唐五代至宋元时,南迁的北方汉人与闽、粤、赣交界的山区的畬族融合而形成。

### 三、闽、客方言基本核心词的来源以及历史层次问题

以往学者讨论闽、客方言的来源以及历史层次问题较多集中在音韵方面(邓1984),而较少从闽、客基本核心词切入,即较多讨论的是“字音”,而非“词音”;罗杰瑞虽然根据几个闽语词给闽语断代以及切分层次,但他依据的仍是汉语音韵史的证据,经典的汉语音韵史的证据固然是汉语方言断代的一个重要标志,但绝非完整;因为我们不能把整个南方方言看作仅仅是古代北方中原汉语的简单延续,南方方言“字音”的存古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方汉化的结果,是历史上强大的北方科举力量及教化系统的表征,是不同的历史阶段汉文化的文读系统的迭置。以东亚语言史来看,音韵系统最容易被完整“汉化”。那么南方固有的土著文化何在?并非完全消灭了!一部完整的闽、客方言史应当包括音韵、词汇、语法等不同的层面,而其中方言基本核心词应是方言年代学最重要的材料。应当采取一种音韵、词汇并重的方言历史层次的分析方法,而非单一的音韵史的方法。

我们认为可以运用词源统计分析法来解决闽、客方言年代学的问题。词源统计分析法的基本观念是两种具有亲缘关系的语言分离的时间深度,可以通过它们继承的词的共享程度来判断(王1991、1998)。词源统计分析法最初由Swadesh提出,他受到化学上发明的碳-14年代测定法的启示,认为:一定存在一组“基本的词”,来描述一定存在于各种语言中的普遍现象。这种基本词汇包括表示身体部分的词(头、手),表示自然物体的词(月亮、山脉),表示共同活动的词(来、睡觉),以及表示一些其他范畴的词。实际上,要确定这样一种基本词汇是相当困难的。Swadesh先提出了200词,后又减少到100词。我们认为Swadesh的100词表可操作性强,最为合适;他的后100词,虽较容易被借用,但仍有比较价值,可作选词参考。

学术界一般认为客、赣方言关系密切,特别表现在音韵特征相似,而相比之下,客、闽方言关系较远,因为音韵特征差异较大;但是比较核心同源词,我们发现闽、客有一批核心同源词;我们认为音韵层面的同一性较多反映方言之间的较晚期关系,而核心同源词则反映方言之间的较早期关系(王1991)。客家先民宋元时经过赣语区域,带来宋元时代的北方音韵系统,插入闽越故地后,与闽越后裔之一——畬族融合,所以造成闽、客一批核心词同源。

闽、客虽都来自以中原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但因入闽时代不同,居住地域的经济生态环境不同,所以形成分野大

的两大语系，闽语主流文化属海洋文化，客家则属山地文化。闽、客有一批不同词汇，这是两大方言分立的基础，造成不同的原因跟北方汉人南迁入闽的时期有关，闽语受秦汉时的古越语影响大，即早期“南岛化”，客话受宋元时畬语影响大，即晚期“南岛化”。

比较 Swadesh 的基本核心词，就闽、客方言的来源以及历史层次方面，有几个新的发现：

（闽语以闽南厦门话为例，参考闽东福州话和闽北建瓯话。客话以连城话为例。闽、客核心词的选择标准：闽语内部五区闽南、闽北、闽东、闽中、莆仙和客话内部三区闽西、粤东、赣南，其中一区通行的特色词，即可视为闽、客核心词）。

1. 闽语保留一批直接来源于古南岛、南亚语的词语，例如：“骹、削、坂（村落）、水田、肉、鱼、舌头（舔）、妳、老虎、团、蛇”，这是北方汉人第一次“南岛化”的重要证据；而客话虽与闽语共同相处在自秦汉以来划定的共同行政区域内，却无此现象。其中“骹（脚）、削（杀）、肉、鱼、水田、舌头（舔）”6 个词在 Swadesh 的前一百词内；Swadesh 的后一百词则有“妳（母亲）、团（儿子）”。例如（因限于篇幅，本文未标注词音的例证，请参见邓 1993、1999、2000）：

肉。闽南“肉”文读 hik<sup>2</sup>，但白读 ba<sup>2</sup>。闽南“肉”白读是个典型的古南岛语词。比较：

印尼 gəruk；拉德 ema 肥；回辉 ma<sup>2</sup>53 肥；阿眉斯 jimal 油；布嫩 mafmuh 肉肥；傣西 man<sup>2</sup> 肥肉；水 man<sup>2</sup> 油；黎 mam<sup>2</sup> 肉。

在南岛语、壮侬语中，“肉肥、油、肉”为同源系列。南岛语第二个音节与闽南语“肉”对应。李方桂给“肉”汉语上古音构拟为 \*ngrijəkw。可见，闽南语“肉”白读形式不在李的体系内，而是来源于古南岛语。

舔（舌头、伸舌头）

闽语 la<sup>2</sup>

客话 le<sup>2</sup>

舔：lhei<sup>3</sup> 川黔东；lha<sup>4</sup>3 湘西；4e<sup>3</sup> 布努；4e<sup>5</sup> 勉瑶；4ia<sup>5</sup> 标敏；le<sup>2</sup> 傣；lia<sup>2</sup> 侬

此词客话、壮侬、苗瑶语音韵形式较接近，但意义微殊，苗瑶语指“伸舌头”；壮侬指“舔”，梁敏将“舔”的苗瑶语古音构拟为 \*dlie。而客话则兼具有此二义。

闽客语此词与南岛语“舌头”“舔（伸舌头）”同源，比较“舌头”：印尼 lidah，拉德 elah，回辉 la<sup>55</sup>；“舔”：印尼 lilat，回辉 lia<sup>33</sup>，福州 lia<sup>2</sup>，永安 la<sup>2</sup>，建瓯 la<sup>2</sup>。从比较可看出，闽语的形式是直接来自南岛语，也就是福建汉人第一次“南岛化”的结果，而客话的形式则并不直接来自南岛语，反映北方汉人入闽后，跟南岛族的后裔壮侬语族人文化接触的结果，是北方汉语第二次“南岛化”的结果。

闽语的南岛语底层是闽语的第一个层次，这个事实不能否认。

2. 闽客语有一批相同的常用口语词汇，这批词汇有以下几个来源：（1）共同来源于古闽越族底层语言；（2）来源于江东等南方文化区域的语言；（3）来源于北方文化区域语言；（4）历史上闽客族群互动的产物。以下是闽客语核心同源词。

（1）与南岛、南亚语词同源的

穿山甲 闽：鲢鲢 la<sup>2</sup> li 客：鲢鲢 le<sup>2</sup> li

梁敏等将“穿山甲”的古壮侬语形式构拟为 \*lin；此词跟南岛语同源，印尼：tengiling 阿眉斯；?aləm。此外，还有“斫（砍）、祖父”等。

（2）与苗瑶、壮侬语同源的（有关词条论证见邓 1999）

例如“媳妇、依、畚（人）、玩耍、潜水（躲）、祖母、喇口、傻、溶化（烊）、安装（斗）、扛（两人抬）、地平（坪）、招手、给婴儿把尿、麻脸（斑面）、青蛙（蛤）、住、歇”等核心词跟壮侬语苗瑶语同源。

闽客同源词仅与苗瑶语同源的（有关词条论证见邓 1999）核心词有：“亲家（畚婆）、伤痂、坏、为人差劲、拉紧、拔、脱、鞋裤等自行脱落、虹、捉拿（拿人，讨媳妇，拿鱼）、推（操）、低头（犁）、摔（拌）、动物的胃、瓜果的囊、寻找（撩）”等。

闽客同源词仅与壮侬语同源的（有关词条论证见邓 1999）核心词有：“生殖器、垃圾、扔、蜘蛛、粥稠、砍削（斫）、口水（澜）、乳房（能）、蟑螂、堤坝、跳、喷射、一（次）、巢穴、胡瓜、洞穴”等。

闽语的壮侬语苗瑶语底层应是闽语的第二个层次。而客家话的壮侬语苗瑶语底层应是客家话的第一个层次。

（3）闽客同源词来源于江东等南方文化区域的语言。

例如：“草（希格片状，竹制蒸物器；《玉篇》竹部：“草，必匙，必是二切，江东呼小笼为草”。笠、筴（架竹竿）、藻（浮萍）《广韵》平声霄韵“藻符霄切。《方言》注：江东谓浮萍为藻”、鸡雉（鸡未成也）《尔雅释兽》：“未成鸡，雉”。郭注：“今江东呼鸡少者曰雉，音练也”、焙（微火烘烤）、水清煮，《集韵》“燂，实洽切”《一切经音义》“江东谓淪为燂。”手甩物，拌，《方言》卷十：“拌，弃也，楚凡弃物谓之拌”、用手埋物《掇集韵》上声马韵影纽：“乌瓦切，吴俗谓手爬物”。谷筴（竹席）、胡螟（蚂蝗）、墟（集市）、笕（竹管）、傍（一块菜地，《方言别录》卷上之二：“傍，吴楚间方言，土之平阜曰傍，沟膝之畦畔处亦曰傍”。一丛草（量词），榭，《山海经》榭，郭注：“今江东人呼草木子房为榭，音符。”席子、糍巴、盛（竹木制盛器）、篁（木盛物器）、

舐、斟(亲吻)。潭，《一切经音义》“南楚之人谓深水曰潭”。

这部分闽客同源词构成了闽语的第三个层次，客家话的第二个层次。它的来源应是受到六朝江东语的影响。六朝江东语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凭借其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优势，以江南为中心向南中国扩散。

(4) 闽客同源词来源于古代北方文化区域的语言。

例如：“卵(蛋)、倚(站立)、醪(霉)、晡(夜晚、申时)、昼(日中)、食、索(绳索)、园(园圃)、樵(柴)、角(木椽)、迹、尾巴、炙(烤火、晒日)、包(油炸，《集韵》：“包，平声爻韵并纽，蒲交切，《说文》：毛灸肉也。”)等。

这部分闽客同源词构成了闽语的第四个层次，客家话的第三个层次。

这批词中闽语反映出很明显的上古音特点，例如：倚(站立)  $\subset$  khia 反映汉代支歌关系，迹 tsioʔ 反映汉代昔韵两分特点，园  $\subset$  hŋ 反映六朝云匣合一特点。而客话则反映中古音特点。

我们(邓 1984, 1998)曾从汉语音韵史角度讨论闽语时代层次的语音证据问题，分析出的结论跟罗杰瑞的完全一样，即闽语可分为汉代、南朝、唐宋三个大层次。以音韵史标准，检查 Swadesh 的前一百词表，结论依然相同。例如反映汉代语音证据的：“火”，闽语：hue3；“火”词上古读微部，一直到东汉才从微部分出，归入歌部。闽语“火”的反映形式暗示“火”词来源于上古微部，不属中古歌部。很可能是西汉音的残余。“倚”  $\subset$  khia，主要元音为低元音 a，反映汉代支歌合韵密切关系。“石” tsioʔ 主要元音为圆唇元音，暗示部分中古昔韵字，来源于上古铎部，反映汉代昔韵两分特点。“牙齿”  $\subset$  khi，李方桂认为跟舌根音谱系的照三系来源于上古复辅音 \* krj 系，它们在闽语中的演变途径是部分章组字丢失 \* r 介音。\* krj - k，另一部分 \* krj - ts。部分章组字念 k 声这显然是上古汉语的残存。“鱼”  $\subset$  hi，“耳朵” hiʔ，部分中古疑日母字闽语读清擦音 h 和 s，这与李方桂构拟的两套上古汉语次浊鼻音声母相合。反映六朝语音证据的：部分云母字读 h，如“云”  $\subset$  hun，“雨” huoʔ，“园”  $\subset$  hŋ 反映六朝云匣合一特点。此外还有鱼虞分立；支与脂之，哈泰，谈覃重韵分别；部分元韵读同魂痕韵。而闽语文读系统的声调、韵摄等的配置则完全反映唐宋语音特点。

3. 闽客核心异源词的方言史特点。一般学者较多关注方言同质性的比较，而往往忽略方言的异质性比较；实际上方言的异质性体现其文化内涵的特性。

(1) 闽客的核心词差异还反映在客话有批词汇与南岛人的后裔——苗瑶、壮侗语族的语言同源，这是北方汉语第二次“南岛化”的结果。客家的形成是北方汉人跟闽粤赣交界地区土著畲族文化互动的结果，而畲族则是隋唐时由外来的“洞庭苗蛮”跟当地土著越人后裔壮侗语族互动后形成，所以，客家话音韵反映唐宋中原音韵，而词汇则是由北方汉语、苗瑶语、壮侗语混合形成。例如：“头那(头)、供(饲养)、嫩子(小孩)、髀(腿)、背小孩、闭椒(辣椒)、干比(臭虫)、媪(母亲)、人畲(人)、箩筐、辣椒、戴(~斗笠)”等(邓 1999)。

(2) 反映汉文化层次早、晚期的差异，闽语反映上古汉语词汇，而客话则反映中古汉语词汇。例如：“鼎一镬(锅)，khi一齿，饮一饭汁，箸一叶(叶子)，箸一筷子，悬一高，青眼一瞎目(瞎子)燥一火”。

(3) 闽语来自壮侗语多，而客话则来自苗瑶语多；客话中的苗瑶语成分要比闽语多得多(邓 1999)。例如“木虱一千比(臭虫)，齐一多(多)，遮一顶(戴)，拍一陌(打)”。

(4) 反映闽客方言自身特色的区别特征词汇，例如：“厝一屋，我一匪，甚么一麻介，柚一禾，查某一铺娘(老婆)，闲一屏(藏)，伊一渠(《太仓州志》“吴人指人曰伊。”《集韵》“吴人称彼为渠。”)水一精(漂亮)”等。这些区别特征词是闽客族群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质所造成的。

#### 四、分析与结论

从以上闽客核心同源词以及核心异源词的比较来看，有以下几个发现：1. 闽客语都有一批最常用口语词与南方土著民族语包括南岛、南亚、苗瑶、壮侗语同源，这批词汇是闽客语不同于其他方言的基础。比较核心同源词，我们发现闽、客有一批核心同源词，由此，我们推论出就谱系亲缘关系来说，闽、客关系较近，而相对而言，客、赣方言关系则较远。我们认为音韵层面的同一性较多反映方言之间的较晚期关系，而核心同源词则反映方言之间的较早期关系。从时间层次来看，闽语明显受第一次“南岛化”影响深刻，而客语则受第二次“南岛化”影响深刻。2. 从空间层次看，闽语的南岛语成分多，客语的南岛语成分少；闽语中的苗瑶语成分应是来自客、畲语，历史文献表示，闽语系漳州族群自隋唐就与畲族有密切的文化互动关系。而壮侗语系列则系福建土著族语言，自南岛语演进而来。3. 闽客语都有一批来自古“江东”的词汇，学者往往只注意到闽语的古“江东”层，而忽视客话中的古“江东”层；其构成“底层”的成因，是由于历史上共处于闽越国的势力范围，是不同族群长期互动的产物。闽语中的吴语成分并非都是“中原汉人南迁途经吴地杂染吴音，后带入闽语”。闽吴互动自周代即始，由来久矣。4. 很显然，闽客语的形成绝非自北方汉语的单线演进，闽客语来源具有很强的多元性，传统的“线性”历史进化论应得到正确的修正。我认为闽客语的形成是“非线性”的。检查 Swadesh 的前一百词表，发现闽语与南岛语、南亚语有关的词有 6 个，而跟壮侗语、苗瑶语有关的词有 10 个，总共有 16 个词来源于非汉语。对比

客话仅有7个词跟壮侗语、苗瑶语有关。但是检查 Swadesh 的后一百词表,情况则发生很大变化,闽客语来源于南岛语、南亚语、壮侗语、苗瑶语的非汉语词的比例远高于来源于北方汉语词的比例。我们认为 Swadesh 的前一百词语言之间较不容易相互借用,较能反映语言的性质;而 Swadesh 的后一百词则较容易被相互借用,反映语言的接触关系。虽然都是同源词,但词的计算“价值”不同。所以,闽客语的语言性质确为汉语无疑,但是在闽客语的整体形成过程中,与非汉语发生极其密切的互动关系,闽客语的非汉语成分应该得到正确的对待和描述。古北方汉语主要体现在闽客语的文读系统中的词汇和音韵层面上。而这正是代表国家的“文教势力”长期以来“汉化”的结果。客话音韵系统来自宋代北方汉语,而口语系统的词汇则是汉语和苗瑶壮侗语混合的。5. 使用人类学的族群互动和文化交互作用圈的理论可以正确解读闽客语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合特性,解释要有时空的观念。

本文语言材料来源:客家话、闽语、畲语材料系本人田野调查报告。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王辅世、毛宗武《苗瑶语古音构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印尼语引自陈枫等《印度尼西亚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63 年版。台湾南岛语引自何汝芬、曾思奇、陈康等《高山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 年版。回辉语引自倪大白《海南岛三亚回族语言的系属》,《民族语文》,1988 年第 2 期。南亚语引自颜其香、周植志《中国孟高棉语族与南亚语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5。

参考文献:

- [1]丁邦新. 吴语中的闽语成分[A]. 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 [2]张光宇. 汉语方言发展的不平衡性[J]. 中国语文,1991,(4).
- [3]李如龙,陈章太. 闽语研究[M].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1.
- [4]黄典诚. 闽南语单词语典[A]. 首届全国方言研讨会论文(厦门)[C]. 1981.
- [5]张光直. 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族起源问题[A]. 南方民族考古[C]. 四川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 [6]张光直. 新石器时代的台湾海峡[J]. 考古,1989,(6).
- [7]何大安. 语言研究中的层次问题[J]. 汉学研究(18卷特刊). 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 [8]梅祖麟. 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9]林惠祥. 林惠祥人类学论著[M]. 福建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
- [10]吴春明. 中国东南土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观察[M]. 福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
- [11]邓晓华. 闽语时代的语音证据[J]. 语言研究(增刊),1998.

## On the Origins and Historical Strata of Old *Min*(闽) and Hakka Dialects

DENG Xiao-hua Willian. S. -Y. WANG

(Chinese Depart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on research on the kernel words proposed by Swadesh, intends to prove that old *Min*(闽) dialect may not have derived totally from Six Dynasties *Jiangdong*(江东) dialect, and old northern Chinese language may not be the only source of old *Min*(闽) and Hakka. The formation of *Min*(闽) and Hakka dialects is the result of long-standing interaction between northern Chinese and the local minority languages. The phonological strata of *Min*(闽) and Hakka dialects shows traces of northern Chinese at different periods, while the vocabulary reflects great influence of southern local dialects. Hakka dialect still bears the strata of *Jiangdong*(江东) dialect. In terms of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 *Min*(闽) and Hakka is close to each other, while Hakka and *Gan*(赣) are more distantly related.

**Key Words:** *Min*(闽) and Hakka dialectology; kernel words; historical strata

[作者简介]邓晓华(1957—),男,福建连城人,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副馆长,从事语言人类学研究。

王士元,男,香港人,台湾中研院院士,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美国《中国语言学报》主编。

[责任校对:余飞]